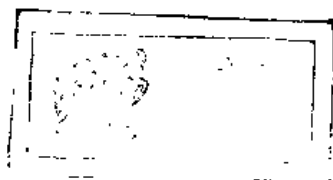


4750
昌图文史资料

(第二辑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图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

目 录

沙河子惨案·····	姚 野 (1)
钱家惨案的真相·····	王富春口述 王春荣整理 (4)
忆“青年将校团”·····	王凤起 (9)
激战在黎明前·····	王凤起 (16)
我在沈阳起义的经过	
著名摄影师兼导演李光惠·····	吕 任 (27)

· 昌图儿女 ·

永不熄灭的火焰	
孙西林烈士传·····	李万新 赵宁 (93)
太行壮歌	
赵晋阳烈士传略·····	县党史办供稿 (117)
山林队里的抗日豪杰	
记田振东司令二三事·····	王金石 (125)
国画家——梁冠山·····	孙太成 (129)
三访韩中舟·····	孙太成 (134)
不慕清凉处士风	
缅怀尊师李载扬·····	刘万顺 (138)

· 昌图史话 ·

僧王父子与昌图·····	刘万顺 (14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张治中将军营救了我·····	纪 元 (152)
吴俊升遗闻轶事·····	窦应泰 (159)
昌图二人转小史·····	韩喜忱 (182)
红顶山兵营·····	孙 庸 (189)

· 地名考释 ·

1、昭苏太河·····	李鸣志 (191)
2、通江口·····	李鸿志
3、亮中桥·····	李鸿志
封二照片·····	昌图县文物所供稿
封三照片·····	昌图县文物所供稿

沙河子惨案

姚 野

一

伪满康德4年（1937年）7月21日零时30分，由哈尔滨往开大连的亚细亚号特别军用列车，像一条火龙，风驰电掣般地撕开夜幕，在东北大地横飞。行驶至昌图县境内的满井火车站北桥时，火车突然脱轨，机车和前四节车箱掉在桥下，其余各节满载着日军官兵，冲撞一起，残伤惨重。哭嚎声、呼救声交织在一起，幸存者象热锅上的蚂蚁，混成一团，哇啦哇啦乱叫，震惊田野，冲破夜空。

翌日天明，远远窥见现场戒备森严，军警宪特，荷枪实弹，如临大敌。除一节尾车完好，其余全部倾倒颠覆。两架吊车不停地装运破车残骸。铁路工人们，在日军监视下，喊着号子抢修铁路。来往过路人绕道百米之外，不准靠近禁区。

伏天烈日，满井桥附近腥臭难闻。死伤人数中国人实难知晓。只知道中长铁路三天未通车。中外震惊。

二

事件发生后，伪满首都新京（长春）的各大报都以显著的位置刊登这一消息和照片。日文《大同日报》在头版头条

披露：“此非自然发生之事件，乃大胆之徒，行其计划，故意破坏之所致也。”故而，由四平省警察厅派要员负责，调集昌图、伊通两县警宪汉奸特务组成破案机关。首先封锁各个要道，寻查探访可疑人。侦破机关分析认为：军用列车行动的时间情报掌握之准确，破坏铁轨工具准备之恰当，扒轨技术之熟练，绝非局外人所能办到，必定是铁路员工所为。他们首先把满井车站线路工蒙氏弟兄二人抓到泉头警察署。三天后又抓走铁路工人郭孝田。当天又到沙河子后街（离发生事故的铁桥近二华里），抓走了东北军钱旅长家的钱富德和钱富生兄弟二人。其实钱富生正在奉天念大学，事故发生后才赶回家来的。根本与事故毫无联系。富生被抓后虽经日系校长出面申诉，并具保打算要回学生，均无效。钱丰太听说他两个儿子都被抓到泉头警察署，不顾一切赶到泉头探听消息，不料也被当即扣留。

警察特务不离钱家左右，见到钱家青壮年就抓走。先后又抓走钱井太、钱富恩、钱富厚。逼得钱家男女老少不敢进家，只好更名改姓四处逃生。侦破机关还发出了通缉令，凡追捕钱家逃犯者一律论功行赏；知情不举者与逃犯同罪。钱富祯逃到此路树女儿家，刚进门就被等候在那里的警察带上了手铐。钱富清逃到昌图老城姑丈人曹义家，进屋不久，就被追捕归案。在看押钱家等人期间，特务们用灌洋油、辣椒水，坐电椅等各种毒刑。有的把手都打成残废，吃东西的时候手不能拿，只好用嘴拱着吃。

这个事件不仅使钱家满门遭劫，还祸及亲友，凡是钱家的近亲至友全受株连。沙河子腰街钱家外甥徐某哥仨、钱家长工王某亲哥俩、钱家表叔许某，也都以嫌疑犯被抓去。一

时间，沙河子后街变成了禁区绝地。因而，钱家十二匹大牲畜，五十多口猪，三十多只羊，全都被活活饿死。鸡鸭鹅狗死的死逃的逃。这一惨案，骇人听闻，目不忍睹。

三

同年8月24日午后三点，天下着小雨。四平南公园一带，突然宣布戒严，禁止车马行人通行，并限制学生外出。四平师道学校的学生们好奇地爬上墙头窥望，只见日本军用大卡车开到四平气象台西侧早已挖好的坑旁，日军把用铁索连在一起的二十多名“要犯”推下车来，当即用战刀一个一个杀害，推进大坑埋掉。此情此景，惨不忍睹。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犯下滔天罪行。

这次被杀害的除钱家的9人，还有钱家亲友10人，铁路职工3人，共22人。

事隔一年后，北平日军宪兵在北平市新桥街香饵胡同36号，把隐居的钱富廷也逮捕归案，不久在北平煤碴胡同被日本宪兵队杀害。

事件发生后，钱富春改名李志清，逃亡在外，远离家乡，乞讨为生，直到“八·一五”光复后，才回到老家。而钱富云吓得脱离红尘，出家东丰庙，留发蓄髻，云游四方，法名“刘老道”。一九四六年初，还俗回乡。现在幸存的钱家后裔，都是当年十岁以下的儿童。

钱家这一历史悲剧，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和中国人民不可侮的铁的事实，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史的铁证。

（作者系昌图县离休教育工作者）

钱家惨案的真相

王富春口述 王喜荣整理

日寇侵占东北时期，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爱国抗日斗争，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，屠杀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同胞和无辜群众。“钱家惨案”就是他们血腥统治的历史见证。那时我在伊通县伪警务科特务系任职（警长衔）参与了钱家惨案的“侦破”活动。虽然事情过去了整整五十年，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后不久，即7月21日晚后半，夜，我在家被伊通警察署西门派出所来人叫醒，要我立即到县警务科报到。在伪满时期，夜间外出抓人那是常事，我以为又要去捕人，便匆匆地来到警务科。到那一看有些诧异，门口停着一辆汽车，司机高锦已经将汽车引擎发动起来，有十多个人正慌慌张张地往车上爬。我仔细一瞧，有伊通县警务科日本首席指导官兼检察官村上义一（警佐衔）、警务科翻译刘春田、伊通警察署特务系警士李奎锋、王守信，还有警务科卫队10人，共15人乘坐汽车离开了县城，向西驶去。

车刚一出西门我就问身旁的刘春田去执行什么任务，村上不叫打听。我们这些人都闷坐在车上，思索着，猜测着。车速很快，一个小时就到达公主岭车站。此时，在铁轨上停着一辆烧清油的小火车，我们立即下车改乘这辆小火车，刚上车，车轮就启动了，往西开去。车过郭家店、十家堡、四

平等站都开绿灯放行。大家在车上暗暗嘀咕着，车早就过了伊通界，怎么还不停呢？车到牯牛哨天已放亮，到泉头站才缓缓停下来。

泉头警察署长张致远，署副日本警尉猪骨左右卫门早就在车站等候，我们一下车他俩就把我们领到满井警察分所。我们会同分所长张肇让等人来到沙河子。沙河子是一条界河，东西走向，河的北岸归吉林省伊通县所辖，河的南岸是归辽宁省昌图县所辖。沙河子距满井分所有二里多地。我们到达河岸一瞧，大吃一惊，一列客车被颠覆在沙河子里。沙河子上面有座铁桥，距水面有十多米高。列车是从桥上翻到水里的，机车头砸入河底有一米多深，连同五节车厢都泡在水里。在铁轨上还停着三节幸存的车厢。肇事现场早已被封锁，在铁路的两侧，头一层是铁道警护队，二层是宪兵，三层是警察。他们都是从南满线的警护队和四平、昌图、开原、铁岭等的宪兵队和警察署调去的，有好几百人维护现场。

我们到达后，带去的十名卫队也布置在铁路的两侧。我和刘奎峰、王守信身着便衣在附近看守。村上义一和刘春田同首都新京宪兵司令部派来的日本军官联系。宪兵司令部派来一名特高课长（少佐衔），是个小个子，长相很凶，由他指挥这个案件的“侦破”活动。

这时，我向别人详细地询问一下事件的经过。原来这是21日从新京（长春）开往大连的“鹄号”急行客车，载有数百人，凌晨12点零3分到达沙河子铁桥时，突然列车脱轨，从十多米高的桥上翻到沙河子里，旅客多数是日本人，内有一名日军少将，还有少数日军。车厢里的人死伤累累，既或

没有摔死，也被河水淹死了。机车上的司机和员工都被烫死了。那个日本侵略军的少将也被摔死，日本兵几乎没有生还的。在我们到达前，从四平开来不少救护车，把伤亡的旅客一批批拉走了。我们到达时，见铁路员工正用嘎斯火分割机车的衔接处，到中午才把机车和车厢分割开。这时从四平开来一辆重型机车，带一个重型车厢，上边拉着一台长臂吊车，把机车叨放在车厢上，就往四平开去。

午后，我们开始了“侦破”活动。我到现场一看，原来在距桥不远的两条铁轨衔接处，两侧都有铁夹板，固定在铁轨上，再用道钉把铁轨固定在枕木上。可是现场情况截然不同，铁夹板的螺丝被拧了下来，道钉也被拔掉，道轨完全失去了控制，导致列车颠覆脱轨。

我们向泉头警察署长张致远和满井警察分所长张肇让了解情况，他俩没提出任何线索。我们三人便分头搜集情报，两天毫无收获。村上义一把我们三个人找去，他瞪着血红眼睛吼着：“你们这些废物，都两天了还没有查到线索。让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把我好顿训。他说案件发生在伊通管辖范围内，命令伊通警务科限期破案。你们三人要通力合作早期破案。”过了一天，乐山警察署长陈久香突然来了。他是泉头人，中等个，大眼睛，穿着灰串绸衬衫，戴着从香港进口的狼草草帽，拿把小伞，冷眼一瞧象个阔商人，我们一问方知，是村上给他去电话，要他来参与破案工作。陈久香原是营城子警察署长，1936年末，他曾把小杂木沟分所搜捕出来的两名地下党员，送交给日本宪兵队，使敌人破坏了伊通地下党团组织，使不少人遇难。他的行径深受日本人的赏识的通令嘉奖，颁发奖金。这次村上叫他登台，定然没有好戏

唱。

果然，陈久香来后根本不同我们在一起进行“侦破”，独来独往，经常同村上嘀嘀咕咕。又过了一天，村上把我们召集到一起，叫汇报情况，我和李奎峰、王守信都没有提出新情况，可陈久香却后来居上，他说据掌握的“情报”，这个案件是钱丰泰、钱富泰两家唆使铁路员工干的。他说在铁路员工家搜出了扳子，是做案工具。

村上义一向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汇报后，7月24日，宪兵司令部派了不少宪兵和伪警察，把西沙河子村团团围住，水泄不通。他们把两家老钱家从12岁以上到72岁以下的男人都逮捕了。有个五岁的男孩，因去姥姥家串门才得幸免。在此之前，敌人就把满井车站的铁路员工全部逮捕。他们说是从内部破案。其中有一位铁路员工叫王山东被捕后，泉头警察署的警察王志民和一名日本宪兵，去他家搜查，要他妻子交出道钉，并威吓她要交不出道钉就带走，同她丈夫一路去。王山东的妻子不用说找出道钉，连一个铁钉都没找出来。

王志民和宪兵走后，王山东的妻子抱起她那三岁的娇儿痛断肝肠呼天喊地哭了一场。她左思右想没有活路了。走到摇车杆子跟前，先将孩子吊在摇车绳的一端，自己吊在另一端，这位年仅20岁的妇女和她那只有三岁的婴儿，被敌人逼得双双自尽。我们闻讯到达时，他们母子早已绝气身亡。她被勒得双目突出，眼角流血，脸色发紫，舌头伸出多长，嘴角上血水滴滴。那个婴儿更是惨不忍睹，张着小嘴，嘴里边含着被勒出来的黄瓜和小米水饭。围观的人们看到如此惨状都唏唏嘘嘘，抽泣声一片。我虽然是伪警察，但还有中国人的

良知，见到他们母子惨相，不由自主地鼻孔发酸，眼睛发湿，泪水几乎没有流下来。

敌人在老钱家、满井车站和西沙河村共抓去28人，送到四平宪兵队和伪警察署关押。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进行了严厉审讯，施以各种酷刑，要他们承认这起案件是张学良将军派人策划的，人们心里都明白，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“西安事变”，是由十年内战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，而“芦沟桥事变”的爆发，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。因此，敌人对张学良将军恨之入骨，妄图通过这一事件打击张学良将军在东北的原有势力，进一步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。敌人从被捕人的口里，是根本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供词。于是血腥的屠杀开始了，8月24日敌人把被捕的28人，用汽车拉到四平气象站墙外，推下汽车，驱赶到早已挖好的深坑里，加以杀害。

敌人在处死那些被捕者以后，对西沙河子村，仍然进行封锁，老钱家牲畜全部饿死，有的亲属也受到牵连。老钱家在北平有个大学生，时值回家度暑假，听到他们家遭到惨杀，就逃往佳木斯。敌人获知后，就派泉头警察署的警察王席珍和一名宪兵，去佳木斯搜捕。把这名大学生抓回来后也送到四平，后被处死。这场惨案先后被敌杀害的有29名，有两人自缢共有31人被他们夺去了生命。

案件结束后，我才回伊通。在这20多天里，一幕幕惨剧，令人发指，日本军国主义者残暴罪行，罄竹难书。

（转自《伊通文史资料》第一辑）

忆“青年将校团”

王风起



作者与夫人富平合照

作者简介：王风起，辽宁省昌图县此路乡三门村人，现年74岁。现任吉林省政府参事，吉林省政协委员，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。青年时曾就读于北大物理系，后入黄埔军校第

十期，最后毕业于陆军大学十七期。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师长，参谋长，总队副司令。

1943年，任远征军长官部少将作战科长时，因密谋推翻蒋介石军事政变未遂被捕入狱，直到1947年获释。同年抵东北解放区。我党分配他潜入沈阳从事策反地下活动。公开身份是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副司令。1948年11月1日，解放沈阳过程中，王风起在党的领导下，成功的策动所部和另外两个师光荣起义。

一九三六年我从黄埔军校十期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军。大约九月，在西安工曲镇军官训练团受训期间，通过王以哲将军（是我的老师）呈给张学良将军一份万言书。内容大致是，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出三、五年一定爆发，此刻应积极准备应付大战所需要的抗日力量，团结东北同乡，整顿

充实东北军。

张学良先生曾召见我于金家巷公馆面谈。拟派我去东北联系其旧部，事未果。后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，张杨两将军发动兵谏扣压蒋介石。蒋被迫应许停止内战，张亲自驾飞机送蒋返京。而蒋竟背信弃义，恩将仇报，把张扣押起来，导致东北军瓦解。我是拥张派，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非常痛恨，私下决心“非打倒蒋介石，决不罢休”。

1939年8月，我以营长资历考入陆军大学十七期，9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为了实现自己打倒蒋介石的夙愿，由我发起秘密组织了“青年将校团”，以陆大同学为骨干，团结黄埔七、八、九、十期同学，联系四、五、六期，提携十一期以后各期同学，用以打倒以蒋介石、何应钦为首的黄埔一、二、三期同学中那些尸居其位的低能者。因为当时的权力就在这群狐群狗党之手。他们为了永保禄位，弄出一个论资排辈的人事制度，排斥贤能。

“青年将校团”主张以能以贤为职位升降标准，取消排辈的人事制度，深得青年将校的拥护。当时陈诚也曾这样主张过，于是“青年将校团”推选我到陈诚司令部做动员工作，一俟政变成功以拥护陈诚为过渡时期的头头。

一见陈诚引为上宾，二见陈诚委为中校作战参谋，三见陈诚擢为上校侍从参谋。由于我所拟的“反攻宜昌战略据点计划”深得陈诚赏识，通令全长官部嘉奖我，嘉奖令是陈诚亲笔写的，原件退我保存。我爱其文简洁，还因为是对我的嘉奖，故对其背诵甚熟。文曰：“查陆军大学十七期毕业学员王凤起所著反攻宜昌战略据点计划一文，笔锋犀利，辞气畅达，能言人之所不敢言，道人之所不敢道，见解精警，

独辟之处甚多，洵建军建国之佳构也，望勉旃有厚望焉。”我再次写整军方案，陈诚找我面谈。半年后，陈诚调为远征军司令长官，我也随陈诚调为长官部参谋处代少将作战科长。

在此期间，我多次向陈诚建议组织“青年将校团”，以为肃军整军的核心。陈以事关重大，值得慎重考虑为词，对我的建议未加可否。他还说：“委座不准任何人搞小组织，你所拟的计划虽非小组织，但不通过委座的许可就会被视为非法。”我仔细推敲后觉得以陈诚那样高地位的人持慎重态度是对的，遂不再向他紧逼应许，只求“青年将校团”的活动在他的掩护下不受阻碍斯已足矣，又何必让他承担责任。

陈诚的顾虑确有道理，果不其然，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，我拟的政变计划被军统特务发觉，报告给蒋介石，蒋命令陈诚逮捕我，并立即用飞机起解到重庆由他亲自审讯。

在我临上飞机前，陈诚令其最亲信的副参谋长刘云翰密告我，无论如何不能涉及陈诚，只要陈诚不倒他就能代我说话得以释放。在昆明停留期间，刘云翰每天来找我面谈，指使我写成书面材料，受审时百供不离原状。

当我到重庆那天，恰是蒋介石出席北非开罗会议，在蒋上飞机前把本案交给戴笠亲自审讯，令将结果呈报给他。

我早已打定主意把本案发生经过的责任完全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上绞架杀头我也认了。事实上，“青年将校团”的发生与起始确与陈诚无关。但此时何应钦，顾祝同、刘峙、胡宗南和戴笠等在反对陈诚的问题上却是一伙，他们借此机企图利用本案案情把陈诚打倒。因此，千方百计逼我供出本案的后台为陈诚。而我的主意已拿定，百问不离原状，供

认不讳“青年将校团”是我一个人搞的。特务机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把我等六名陆军大学十七期毕业同学，梅含章、陈蕴山、曹泽衡、付岳、胡翔和我分别关在中美合作所内六个地方，进行隔离审讯以免串供。两年后案情已定，把我等六人集中关在渣子洞，后移白公馆，前后达三年半之久，威逼利诱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可以想见他们是怎样的重视本案了。特务机关曾向蒋介石吹嘘说，若不是他们神通广大发现“青年将校团”的计划，国民党的统治局面就要完全变样。他们说，这是国民党建立以来所遇到的最严重、最危险的一次政治案件。于是，他们得意洋洋地宣传其成就和功绩。我们六个人也就成了他们的战利品，而不能轻易得到释放。

一九四六年春，戴笠坠机毙命，特务机关大有树倒猢猻散之势，牢规也松动多了，探监的人也多了。我用钱买通小特务，让他们代我通信给好友汪奉曾上校。汪是“青年将校团”骨干分子，当时是陈诚的机要侍从参谋，后为陈诚的卫队团团长。我请汪团长把我写给陈诚的信直接交给陈诚本人，要求陈诚向蒋介石建议把本案移交给军法总监，实行公开审讯，该枪毙的就枪毙，该释放的就立即释放，该判刑的就判刑。这样做的后果，我们六人就会获释。因为审讯我们的时候，特务们完全以陈诚为主，认为我们不过是陈诚的帮凶而已。如果真的把我们移交军法总监进行公开审讯，陈诚势必得出庭受审。但此时戴笠已死，陈诚正在走运升任参谋总长，总管海、陆、空三军，特务机关怎敢得罪他呢？最后，只得把我等六人美化一番，上报蒋介石一释了之。果不出所料，陈诚于1947年初向蒋提出建议，3月底我等六人一

同获释，恢复原职，令到南京国防部报到，听候分配工作。

在坐牢期间，受难友黄显声、宋绮云、韩子栋等同志的启发指教，思想起了变化。黄显声、宋绮云听说我等六人即将出狱，曾多次劝我出狱后别再跟陈诚混了，应立即去解放区、为停止内战而奋斗。

我认为共产党对我这半路出家的人是不会相信的，如果到了解放区，让我从头来，我可不干。而重要职务我又干不了。所以我想，一旦出狱一条路是退出政治舞台，跟陈武锐（华侨，狱中难友）去南洋当华侨；一条路是继续跟陈诚混，发了财去美国做寓公。原因是我受审期间，没有株连着陈诚，他一直在感激我，而且我又是他的亲信旧部，深得其信任。跟着陈诚必能很快飞黄腾达。但我曾发过誓，不打倒蒋介石决不罢休。逃到台湾去还是蒋的天下，在那个新天地我又不能反蒋，这可真是事与愿违了。因此，我决定走前一条路去当华侨。

黄显声坐牢的罪名是他给中共做兵运活动。他早已与共产党取得了联系，他和高崇民同志都是张学良将军的旧部，而高已在解放区，他坚决主张我去解放区找高崇民同志。黄一再强调他和高崇民的特殊社会关系。他告诉我：“你到解放区哈尔滨见到崇民同志，就说我黄显声让你来的解放区，就可以取得中共的信任。”宋绮云同志指教说：“不可逃避现实去当华侨，应当冲向革命洪流，迅速把蒋介石打倒方不负好男儿的一生。”他们的启发和指教对我出狱投奔解放区哈尔滨起着决定性作用。

出狱后，我多方面物色人去哈尔滨找高崇民同志，恰好富平（我现在的老伴，她是辽宁省开原县老城人，40年代已为

我党的地工人员）当时已和其前夫刘佩伟离婚，住在重庆南山黄桷桠，她在社交场合结识了刚刚出渣滓洞的军统特务肖曼留，她向肖打听我的下落，肖就把和他同住的情况详细告诉了富平，并与她同到渣滓洞看我，我知她和高崇民、阎宝航两同志很熟，经常来往。因此，我出牢后动员她和我一同去解放区找阎、高两同志。富平初时不肯，我将黄显声将军劝她务必来解放区的信交给了她。她经过几天慎重考虑后，才应许同行。

当我俩来到沈阳后进入解放区又是个难题。通过富平的胞妹富玉雪同志（在中正大学）介绍与我方地工人员文迟同志相识（现在大阪任总领事），由他把我俩送到辽北省白城子阎宝航主席那里。阎主席给高崇民写了一封介绍信。到了哈尔滨，高崇民把我俩介绍给社会部邹大鹏、陈钟两同志。在我会见阎宝航主席的当时就把来意向他讲了，我是为了在蒋管区发动一个大的罢战运动，为推翻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而来解放区的。但邹、陈两同志首次接见我时却否定了我的想法，对我说：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，我们不需要任何反动派组织联合政府。今天是一面倒的大好形势，我们希望你在解放东北中做出贡献，一旦做出成绩党是不会忘记你的。

我的希望破灭了，后悔不该来解放区，当即要求把我送回去。但邹、陈两同志仍继续动员我在敌占区沈阳城内从事策反工作。他们说：“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，哪怕你策动成功一个连或一个排从中起义，给我军开辟一条通路使沈阳顺利获得解放，就是你最大贡献。”并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兄弟只要你真的做出贡献，党是不吝奖赏的，须知我们也是一个